

陈建军 —— 著



故纸新知

现代文坛史料考释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故纸新知

现代文坛史料考释

陈建军 ——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故纸新知:现代文坛史料考释/陈建军著.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22. 10

ISBN 978-7-5680-8662-2

I. ①故… II. ①陈…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史—文学史研究
IV. ①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140937号

故纸新知:现代文坛史料考释

Guzhi Xinzhi : Xiandai Wentan Shiliao Kaoshi

陈建军 著

策划编辑:陈心玉

责任编辑:孙念

封面设计:三形三色

责任校对:刘竣

责任监印:朱玢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电话:(027)81321913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

邮编:430223

录排:孙雅丽

印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1

字数:265千字

版次:2022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69.9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小 引

本书收录大小文章共39篇，最早者发表于2015年4月，最近者发表于2022年8月。

全书分为正编和附录，其中正编37篇，附录2篇。正编所收文章将主要研究对象大体相同或相近者归在一起，再按发表时间先后编次。所有文章均在题注中交代具体发表情况，以备查考。部分文章在收入本书时，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改，有的还附了“补记”。

这些文章侧重于现代文坛史料考释，与我先前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掸尘录》是“一路货色”。本想将本书的书名拟作《拂尘录》，意在构成一个“系列”。策划编辑陈心玉女史担心二书容易弄混，故在她的建议下改名为《故纸新知》。

在《掸尘录》封面上，印有我写作史料研究文章所奉行的三条基本原则，这里不妨重申一下：

- 一是用史料说话，把每条史料的来龙去脉尽可能地交代清楚；
- 二是重在史料呈现，多叙史事，不轻易发议论，最忌妄下断语；

三是对史料的考辨或阐释，力求言之成理，信而有征。

这类文章，我是喜欢写的，以后还会继续写下去。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中所有引文，均尽量保留原貌；如有明显的讹字、衍字、脱字，则酌予订正，或加脚注说明，或随文加按语，或将所改动者以小一号字分别置于〔〕、〈〉、（）内；无法辨识之文字，以□代之。

谢谢责任编辑孙念女史。女史专业功底扎实，审校认真仔细，帮我改正了不少错误。

陈建军

2022年夏于野芷湖畔

目 录

《战鼓》旬刊及卞之琳的《“睡在鼓里”》	001
戴望舒的一封辩诬函	006
丰子恺小学时的一篇参赛作文	010
写在新编《缘缘堂随笔》出版之前	014
《东南日报·沙发》上的丰子恺佚文	019
关于黄裳的一封短笺	030
梁遇春致胡适信	034
林徽因集外文辑说	037
凌叔华的《小哥儿俩》	047
又见陆小曼佚文佚简	051
陆小曼手札和启事	056
“马良材”是谁	062
新发现的穆时英佚文佚简考释	069
穆时英《清客的骂》及黎锦明信片	084
钱锺书桃坞中学时的一篇英语作文	089
沈从文佚简一通	094
当作家遇上笔名雷同	098
沈从文的一篇佚文	101
《大国民报》刊沈从文佚文及其他	105
从《汪曾祺全集》说到汪曾祺佚文	119

汪曾祺致《人民文学》编辑的一封信	134
汪曾祺又一笔名“曾淇”	140
闻一多致容庚手札	144
闻一多《〈高禘郊社祖庙通考〉跋》小识	148
闻一多致梁实秋一封书信考释	158
闻一多与唐亮画展	172
新发现闻一多十四行诗一首	177
《徐志摩全集》：值得信赖和珍藏的一部全集	182
徐志摩关于《康桥再会罢》的更正函	188
再谈徐志摩书信尚需重新整理	193
徐志摩集外拾遗录	209
新发现徐志摩佚信一通	216
徐志摩致胡适“千字信”写作时间及其他	220
徐志摩译文《“现代的宗教”》	228
郁达夫佚简两通考释	237
俞平伯《槐屋梦寻》拾零记	247
“霜庐”是张爱玲的笔名吗？	253

附录

《上海画报》中的徐志摩、陆小曼史料	263
民国时期武汉大学“作文”教学研究	306

代跋

中国现代作家全集整理、编纂的术与道	329
-------------------	-----

《战鼓》旬刊及卞之琳的《“睡在鼓里”》¹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在炮火声中，先后诞生了一大批以宣传抗日救国为宗旨的刊物，《战鼓》旬刊即为其中之一。

《战鼓》于1937年12月11日在成都创刊，其创刊号和第2期（1937年12月21日）编辑者为战鼓旬刊社，发行处为悦来商场四十五号，代印处为复兴日报印刷部。自1938年2月1日第3、4期合刊起，编辑、发行者均为战鼓旬刊社，诚达印书馆为印刷所。创刊号出版时，尚未申请登记，第2期刊头处有“本刊正呈请审查登记”字样，到第3、4期合刊，始见“本刊已呈请成都省党部登记”的说明。《战鼓》虽名为旬刊，但后几期因“负责人的人事倥偬”而未能克日出版。

《战鼓》创刊号开篇《我们的态度》提出“信仰三民主义为中国自力更生之救国主义”“训练民众，组织民众，动员民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铲除一切恶化腐化之封建势力”“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等七条主张，表明“同人之对时局态度，

1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5年5月13日第14版《文化周刊》，题为《从〈战鼓〉中卞之琳的〈“睡在鼓里”〉说起》。

亦即同人之信仰”，可以视为这一旬刊的发刊词。

《战鼓》所载主要是与抗战有关的消息、时评、言论、国际情势报道等，但也刊发诗歌、散文之类的文学作品。其作者绝大部分是当时四川大学文学院、法学院的教师，且多署笔名。

以翻译为主业的罗念生在第2期上发表了一首散文诗，未见收入2007年4月版《罗念生全集》，当属一篇佚作。全诗不长，兹过录如下：

散文诗

这空气太沉重了，每方寸有千钧的力量压在我们的肩上，我们的心上。白云从我们的口里吐出去飞向那天边，偶尔被轻风吹散，放出几线光明，万方的狼犬便狂吠起来。鬼神不住在那云端，住在人间，每一个生灵都是一位自尊明神。云，云背后的光，光里的真神。

注：“真神”指资中，罗泉井。

廿六，十一，十九，破黎。

第3、4期合刊《编后记》云：“名学者闻宥教授的大稿因交来稍迟，不克排入版中，这要请闻先生的原谅，下期当与读者们握手会面。又下期将有朱光潜、谢文炳两名家的大作出现，请读者们注意。”但1938年3月23日第5、6期合刊并未出现闻、朱、谢三家的大稿或大作，编者又在《编后记》中说：“朱光潜、谢文炳先生之大稿要下期才能印出。文（闻）宥先生之稿已取去修改。”目前所知《战鼓》仅为6期，出完第5、6期合刊后，《战鼓》似乎再没有“下期”了。

创刊号里有卞之琳的一篇散文，题名为《“睡在鼓里”》，也不见收入已版各种卞之琳文集。

“睡在鼓里”

有一句俗话，叫作“睡在鼓里”，意思大致是说一个人事已临头，而还糊里糊涂，什么也不知道。不管有无出典，但就字面的意义上说来，实在好玩：想想看，怎么睡法？今天为了功课的事情，走到一处办公室，遇见赵先生，承嘱写文章给一个新办的刊物——《战鼓》，只一下又给敲动了我的鼓思了。

今年暑间小住浙南雁荡山某寺，每在一天八小时埋头工作，握管凝思中，宛然如梦醒来，被惊起于咚咚咚的急鼓（渔阳鼙鼓动地来吗？）。原来隔壁佛堂，三数小和尚，厌来了念阿弥陀佛，常偷来把鼓乱打一阵子，口里哼着“大抵大抵大大抵……”当时正在卢沟桥事变以至平津失陷的期间，那边虽也有公路与外界相通，消息总到得非常慢，令人不堪忧闷。我与一位同来的朋友向外边写信的时候总想此“山中方一日”，而我还对朋友在信上说我们住在这个谷中犹如闷在一只葫芦里，其实还不如说在鼓里，听小和尚在隔壁乱敲。和尚做法事，敲的钟鼓或可以敲醒世人的迷梦吧，而小和尚擂的战鼓，仿佛又在敲醒另一种梦。想起来非常滑稽，而在当时亦只有苦笑。

原定在山中住两个月，结果只住了一个多月。在一连好几天暴风雨，与外间完全隔绝了一星期以后，就提早出来，辗转坐轮船汽车于八月十四日经过绍兴，看当地报纸，才知道上海已开战。当日到杭州，台北战机也就跟来了，真仿佛“世上已千年”。回到上海，住在租界里，只听见炮声，飞机声，炸弹声，却一直没有听到战鼓。可是往往深夜梦断，猛听得黄浦江中敌舰所发的高射枪炮，密过于联珠，宛然鼓声，不由得又想到这个好笑的比拟：睡在鼓里。

到了四川，接得深陷北平的一位南中朋友的来信。据说他现在与一位僧人同租了房子，安贫乐道，禅定智慧都有精进，但说到成都可又怪了。他想起的是当年诸葛孔明六军驻马的风度！小和尚擂

战鼓果然是偶然的，只能说有点象征的意味，而我这位朋友的这一点矛盾却不能说没有意义了。

于是乎我：想今日之下，欲在鼓里睡，而且睡着，不亦难乎。

十一月二十四日

卞之琳围绕“睡在鼓里”这一句俗语做文章：小住雁荡山某寺时，“握管凝思”中，每每被小和尚敲打的鼓声惊醒。住在上海租界内，常常“深夜梦断”，被敌舰所发“密过于联珠，宛然鼓声”的枪炮声震醒。身处战乱年代，“欲在鼓里睡，而且睡着”，几乎成了一种奢望。

文中提到了三个人，或只道其姓甚，或以“朋友”代之。那么，这三个人到底是谁呢？不妨略加考索一下。

所谓“一位同来的朋友”，显然是指芦焚（即师陀）。1937年6月，卞之琳和芦焚由上海同往浙江雁荡山，住在灵峰寺大悲阁客寮。芦焚创作小说，卞之琳则应中华文化基金会编译会特约翻译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的《窄门》等。他俩原打算在山中住两个月，结果因“不堪忧闷”而提前下山了。8月12日到海门，随即西上至临海。14日途经绍兴，看当地报纸，始知上海已开战（即“八一三”事变）。15日回到上海，卞之琳住租界内李健吾家。不久，被四川大学文学学院院长朱光潜聘为外文系讲师，遂复一路向西，于10月10日抵达成都。

11月24日，卞之琳“为了功课的事情，走到一处办公室，遇到赵先生，承嘱写文章给一个新办的刊物——《战鼓》”。据《战鼓》第5、6期合刊《编后记》最后一句“外稿及订户单请一律交四川大学赵城收转”，卞之琳所说的“赵先生”很可能是指“四川大学赵

城”。更进一步推断，这个赵城或许就是《战鼓》的负责人，而未署名的《我们的态度》大概也出自他的手笔。在创刊号上，赵城还以实名发表过一篇《论抗战文学》。

卞之琳说，他到四川后，“接得深陷北平的一位南中朋友的来信。据说他现在与一位僧人同租了房子，安贫乐道，禅定智慧都有精进”。这位“朋友”，应该是指废名。废名是湖北黄梅人，卞之琳是浙江海门人，都是南方地区即“南中”的。卞之琳小废名9岁，他和废名属于“忘年交”。1933年，卞之琳从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并与已是北京大学国文系讲师的废名第一次见面。此后，二人时相过从，常有书信往还。1937年1月，卞之琳译完纪德的长篇小说《贖币制造者》，从青岛回北平交卷，一度住在废名的寓所北河沿甲十号。其时，废名曾认真地对他说“会打坐入定”¹。“卢沟桥事变”以后，按规定，废名不能随北京大学南迁。由于交不起房租，便寄住在雍和宫的喇嘛庙里。庙里有位僧人，法名寂照，是废名中学时的同学。关于废名禅定之事，周作人在《怀废名》一文中也有记载，可以印证卞之琳的说法。“废名自云喜静坐深思，不知何时乃忽得特殊的经验，趺坐少顷，便两手自动，作种种姿态，有如体操，不能自己，仿佛自成一套，演毕乃复能活动。鄙人少信，颇疑是一种自己催眠，而废名则不以为然。其中学同窗有为僧者，甚加赞叹，以为道行之果，自己坐禅修道若干年，尚未能至，而废名偶尔得之，可谓幸矣。”²1937年底，废名回到湖北黄梅，蛰居乡野达10年之久。其间，完成佛学著作《阿赖耶识论》，想必正是他安贫乐道、静坐深思、智慧精进、妙悟所得的结果。

1 卞之琳：《〈冯文炳（废名）选集〉序》，《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2期。

2 药堂：《怀废名》，上海《古今》半月刊1943年4月16日第20、21期合刊。

戴望舒的一封辩诬函¹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次年5月，戴望舒由上海到香港，任中国文化协进会理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留港会员通讯处干事等，主编《星岛日报》副刊《星座》、诗刊《顶点》，编辑英文版《中国作家》等。1941年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1942年3月，日本宪兵以从事抗日活动的罪名，将戴望舒拘捕。戴望舒备受酷刑，但始终坚持民族气节、宁死不屈，并写下《狱中题壁》等充满爱国情怀的诗篇。同年5月，戴望舒被保释出狱，但仍受到“不得离港”等限制。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他才获得人身自由。1946年春，返回上海。

抗战胜利以后，全国兴起检举汉奸运动，文艺界也不例外。

1945年9月11日，戴望舒致信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后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报告自己从港战发生以来的情况。9月24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复函戴望舒，委托其负责“调查附逆文化人”²。可是不久，戴望舒本人却被检举为汉奸。1946年2

1 原载《中华读书报》2021年7月7日第14版《文化周刊》。

2 《文协函慰上海作家并请调查附逆文化人》，重庆《大公报》1945年9月25日第1张第3版。

月1日，桂林《文艺生活》光复版第2号发表《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对于惩治附逆文化人的决定》，同时刊发21位“留港澳文艺作家”联合署名的《留港澳文艺作家为检举戴望舒附逆向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重庆总会建议书》。《建议书》指控戴望舒在香港沦陷期间，“与敌伪往来，已证据确凿”，并附证据三件。针对指控，戴望舒写了一封真切沉痛、感人肺腑的“辩白书”¹。他说：“我曾经在这里坐过七星期的地牢，挨毒打，受饥饿，受尽残酷的苦刑（然而我并没有供出任何一个人）。我是到垂死的时候才被保释出来抬回家中的。”还说他拒绝参加敌伪组织及其活动，“没有写过一句危害国家民族的文字”。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重庆总会大概收到了戴望舒的“辩白书”，最终未采信那些“留港澳文艺作家”的建议，没有认定戴望舒为“附逆文化人”（一说是夏衍直接干预的结果）。

风波本已平息，没想到两年之后，又有人说戴望舒是被通缉的汉奸。

1948年3月22日，上海《东南日报》第1张第4版刊登消息《粤高院通缉汉奸三百余名 传叶灵凤戴望舒匿居本市》，内中称：“广东高等法院最近通缉汉奸一批计三百余名，文化汉奸叶灵凤，戴望舒亦在其内。传叶戴二逆，改姓更名，潜居沪市。”3月24日，重庆《大公晚报》也发表了题名《粤高院通缉汉奸 传戴望舒叶灵凤匿居沪市》的消息，其电讯头为“广州二十三日电”。

戴望舒看到《东南日报》上的消息后，“不胜骇异”，遂于3月24日致信《东南日报》，请予更正。全文如下：

逕启者，本月二十二日贵报第一张第四版，载有粤高等法院通

1 冯亦代曾保存着这份未刊手稿，几十年后转送给了李辉。参见李辉：《难以走出的雨巷——关于戴望舒的辩白书》，《收获》1999年第6期。

缉汉奸三百余名消息一则，独举出叶灵凤及鄙人姓名，并称叶君与鄙人均改姓更名，潜居沪市等语，阅之不胜骇异。按鄙人在港，身陷日寇牢狱，受尽虐刑，始终不屈，事实俱在，人所共知。（忆贵报《长春》副刊亦曾刊出短文一篇，记鄙人在港时编制民谣打击日寇事。）胜利后复员来沪，先后在国立暨南大学、国立音专及市立市专等校任教，得暇并为各报章杂志撰文，现寓本市其美路新绿村，从未改姓移名，更无所谓潜居，贵报所载种种，想必出于别有用心者之恶意毁谤，用特奉函，请予更正。是所至感！此上
东南日报

戴望舒顿首

三月廿四日

3月26日，这封信刊发在上海《东南日报》第1张第4版“来函照登”栏。戴望舒认为，他在香港“身陷日寇牢狱，受尽虐刑，始终不屈，事实俱在，人所共知”，而《东南日报》所载的不实消息，是别有用心者对他的“恶意毁谤”。

信中，戴望舒提到“贵报《长春》副刊亦曾刊出短文一篇，记鄙人在港时编制民谣打击日寇事”。“短文一篇”即指马凡陀所写的《戴望舒所作的民谣》，发表在《东南日报》1946年11月9日第2张第7版《长春》。文中说，香港被日寇入侵后，民间广为流传一首讽刺日本侵略者为祀奉所谓“阵亡英灵”而建造“忠灵塔”的民谣——“忠灵塔，忠灵塔，今年造，明年拆”，是戴望舒写的。当时，戴望舒所编制的民谣共有十几首，其中一首诅咒日本“神风飞机”的民谣是这样写的：“神风，神风，只只拨空，落水送终。”在马凡陀看来，以《雨巷》等抒情诗闻名的戴望舒“忽然写出这种朴质的作品来”，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任何认真地生活在这个时代中

的人没有不受时代的波动的，何况一个敏感的诗人呢？”他还说“戴先生曾被捕下狱，受尽苦楚。虽然生还，身体大受影响”。此后，汉口《大刚报》（11月12日）、重庆《大公晚报》（11月14日）、贵阳《中央日报》（11月27日）等报纸纷纷转载了这篇文章，在文末署有“文联”字样。11月18日，香港《华商报·热风》第229期转发时，改题《香港的战时民谣》，文末标示“文联社特稿”。马凡陀的这篇文章为戴望舒洗清冤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所以戴望舒在信中特别提到两年前的这篇短文，以正视听。

1948年4月11日，《青岛晚报》上有一则简讯，题为《戴望舒不白之冤》，对《东南日报》所载消息及戴望舒信作了比较客观的报道：“日前上海某报记戴望舒有附逆嫌疑，与叶灵风之名并列。此讯刊出后，载（戴）立函该报更正……上海某报以戴行踪秘密，实误传，戴寓于上海江湾其美路，且常在各种文艺集会中漏（露）脸焉。”

戴望舒写给《东南日报》的这封辩诬函，未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月版《戴望舒全集》，也不见有论者提及。

丰子恺小学时的一篇参赛作文¹

前不久，翻检民国期刊，看过一种很好玩的少年儿童类杂志——《中华童子界》月刊。

《中华童子界》是中华书局旗下的“八大杂志”之一，1914年7月25日创刊于上海，中华童子界社编辑兼发行，1917年6月25日终刊，共出36期。这份杂志设有“童子俱乐部”栏目，几乎每期都举行各种名目的“悬赏”活动，如“作文悬赏”“习字悬赏”“图画悬赏”“特别悬赏”等。创刊号（即第1号）“特别悬赏”题为：

设如父亲命我往某处，限定时刻，不许耽搁。半途见一同学，为恶童所窘。我若救助同学，必迟误父事，然则应如何处置？

答案各述己意，须合情理，不限字数。优等者赠童话二册。

针对“悬赏”题所规定的情境，童子们会做出怎样的处置呢？怀着一种好奇心，我急切地想知道他们所给出的“合情理”的答案

¹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5年4月15日第14版《文化周刊》。